

重庆雾与中国抗战文学

张武军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9;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要:雾原本是重庆的一个地域自然现象,成为战时作家们最受青睐的意象。对于雾,作家们有欣赏它保障生命安全的一面,也有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戏剧和长篇小说创作繁荣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作家们也厌恶雾对人的压抑,并上升到雾和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象征关联。对于雾这一意象的全方位分析,有助于理解抗战时期文学与重庆政治中心地位及地域文化复杂性关系的把握。

关键词:重庆;雾;政治中心;生存保障;创作保障

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2-0162-04

抗战爆发后,重庆市为战时首都,不少作家来到重庆,他们一方面体现出对政权的疏远和反抗,另一方面体现出对重庆地域的无奈的或主动认可。重庆的政治中心作用、重庆的地域文化同作家的生存体验及创作呈现出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我觉得可以从一个很有意思的重庆意象说起,这就是重庆的雾。重庆别称“雾都”,重庆的雾给作家们留下深刻印象,反复出现于笔下,见证了战时重庆文学的命运。

作家们离开重庆后,一直念念不忘重庆的雾,很多人在撰写回忆录时,常用“雾重庆”的称呼。茅盾回忆重庆的生活和写作,题为《雾重庆的生活》;臧克家题为《少见太阳多见雾》;臧克远也写了《雾茫茫山城诗话》;秦牧回忆录题为《战斗在雾重庆》。还有许多人虽未以此为题,但也对重庆的雾做了很多表述。方敬回忆:“抗战开初,我在成都,后来跑昆明,走桂林,闯贵阳,八年来行踪不定,四方奔波。对重庆,它的阴与晴,爱与憎,笑与泪,直接体验少,缺乏亲身的感受。只听说雾重庆,一个雾都,笼罩着自然的雾,也笼罩着政治的雾。但是团结、抗战、进步、民主的光明力量总要拨云雾而见青天。”^[1]徐迟回忆说:“那时候,重庆的雾成了一个象征。它不特使人不舒服,而且令人汗毛竖起,战栗不已。风高可以放火,月黑可以杀人,大雾迷漫的天气里可以干一切见不得人的卑劣齷齪的血腥勾当。那时的山城是个特务世界,有人在雾里永远消隐不见了……1944年起雾时,国民党的贪污腐化已经发展到了极度。”^[2]正如方敬和徐迟所说,很多作

家使用“雾重庆”只是因为“重庆的雾成了一个象征”,象征着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与黑暗。解放后,在描述解放前的重庆时,具有政治象征意味的“雾”总是必不可少,如周而复的《雾重庆》、王火的《浓雾中的火花》、曾宪国的《雾都》,以及描写国共两党谈判的《黑雾红尘——国共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等。重庆的雾就仅仅象征着“黑暗”?到底是雾遮蔽了我们,还是我们遮蔽了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琢磨的问题。还是让我们回到历史现场的记载中。

张恨水在《重庆旅感录》中说:“人或言,贵阳乌烟瘴气,重庆暗无天日,谗语,亦事实也。就愚在川所经历,大抵国历11月开始入雾瘴时期,至明年3月开始渐渐明朗。即明朗矣,亦阴雨时作,不能久晴,苟非久惯旅行,贸然入川,健康必难久持。其在雾罩时期,昼无日光,夜无星月,长作深灰色,不辨时刻。晨昏更多湿雾,云气弥漫,甚至数丈外混然无睹。故春夜月华,冬日朝曦,蜀人实所罕见。又此间无大风,亦鲜霜雪。草木昌茂,殆由是欤。”文章末尾还特别点明:“密雾笼山,寒窗酿雨,书于枣子岚垭公寓楼灯下。”^[3]此文续篇仍用较多笔墨介绍了重庆的雾:“盆地多雾,入冬愈甚,就经历所得,雾可分为黑白两种。白者滃涌,凝结较浓,十步之外,渺不见物。然天晓弥漫,午则渐消。残雾升空,遂成层阴。故在是日,可偶得夕阳一瞥。黑者遮盖天地,颇似昼晦。近视之,楼阁烟笼,远视之,山川夜失,终朝阴郁,不辨旦暮。雾结过久,辄变为烟雨,烟雨不散,更降为巨霖,巨霖之后,蒸气入

* 收稿日期:2008-10-28

作者简介:张武军(1977-),男,陕西大荔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抗战文学和文化。

地,可得小晴。顾小晴不克重朝,浓雾又起矣。”^[4] 无论其描写可喜还是可厌,都是雾的自然呈现,是从日常生活作出的评判。

抗战期间,如果真要从人的生存出发,那么雾更多地就应受到人们的欢迎。雾是天然的防空设施,浓雾笼罩就不必担心敌机轰炸。日军为了一举解决中国战事,准备溯江而上,攻占重庆,迫使中国政府投降。然而重庆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得日军靠大兵团作战的计划严重受阻,除空袭之外别无他途。日军第一次轰炸重庆是在1938年12月26日,但并未造成多大损伤,原因就是浓雾保护了重庆。后来日军轰炸都避开雾季进行。当时的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宪光回忆说:“零星的空袭整个夏天都在进行,当大雾迷漫的冬天到来时,重庆才松了一口气。而在1940年春天又被更猛烈的空袭所破坏了。重庆虽然准备了避难所,但从这年春季到夏季,政府官员却濒临生命的危险,在洞内夜不成寐的苦境中喘息。这就是日军得意的神经战的空袭。空袭常常一连持续三个小时,重庆除了承受,别无他法。”^[5] 在雾季,重庆可以松一口气;没有雾的日子,面对猛烈空袭,重庆除了承受别无他法。当雾可以成为生命的保障时,大家能不喜盼雾的到来吗?

作家李又宁回忆说:“在张家花园的时候,生活在空袭的阴影下。众所周知,重庆是雾城。雾重或下雨的日子,敌机不会来;晴空或月夜,则反。因此,天气不好,人们比较心宽;天气好,心情沉重。”^[6] 沧一来到重庆,很有感慨:“自七七事变以来,我国的重要的城市,几乎都遭到了敌人的铁鸟光顾。只有这重庆,在经年的多雾的万山丛中,市民至今还浸融在和平的氛围里,度着闲适的生活。无怪一般逃难来川的朋友们,一见面就惊异地说:‘你看,四川人的镇静多么有功夫!前线战斗的那样激烈,战区人民逃命那般的苦痛;那种情形,无论谁见了都要感动的流出眼泪!就是在后方的武汉、长沙、宜昌等城市的居民,也无日不在空袭警报中过着紧张的生活。然而一入夔门,正如进了桃花源一样,什么事都平静下来了!”^[7] 在重庆生活的思红也对雾的到来表示了渴望和赞颂:“重庆最有名的雾罩,这几天应时光临了,永远昏昏沉沉的,抬头看不见晴天白日,俗语说:‘夏日可畏,冬日可爱。’重庆夏天的炎威,特别是今年,真晒得厉害极了。现在到了冬季,不要说‘负曝献枕’根本谈不到,简直自朝至暮谁也没有见过那太阳究竟从什么地方升起来,什么地方落下去,这样闷人的环境,岂不叫人扫兴?但是一般人的心里正兴高彩烈,欢迎那厚重的雾罩,唯恐其不久不密。最好要密的像上次,有一回某公司的飞机到重庆在上空盘旋了半天,始终找不到机场,竟飞到了成都才停了下来,那样的糊里糊涂,更加欢迎。究竟这种难得的天然消极防空设备,千载一时,

岂能错过利用的机会。一次疏散,二次疏散,重庆的人不知为什么愈疏散愈多,马路上摩肩擦踵,推不完,挤不开;一天到晚,无时无刻不像戏院门口散场一般。最近受雾罩的吸引,情形更紧张了,大概这些人靠雾罩保险,自以为领过了安全证,名为疏散,暗实集中,重庆的人口密度怕离饱和量不远了。”^[8] 顾梦五谈到重庆空袭时说:“科学征服了自然,可是自然尚能发挥它的力量以阻止科学的猛攻。盆地气候的湿热,使每年有一半的日子被白雾笼罩着,大抵再过一个月,重庆城便要没入弥漫的白雾中,而日军空袭也相当的困难吧!”^[9] 凯礼记述了1940年元旦重庆的情形,尽管夏天遭受猛烈轰炸,但到冬季就又恢复了活力:“将近傍晚的时候,人行道上站满了男女老幼,尤其妇孺们。因为有天然的防空网(浓雾),四乡赶来看热闹的人特多。”^[10] 热闹的场面一直持续了整整三天,这样的情形自民国以来在重庆还从未有过。

因为有浓雾保护,大家安心地投入到各种活动中。作家们也是如此,在日军轰炸最疯狂的时候,大家都四散到乡下躲命;雾季到来,才集中到城里安心写作和参加文协各种活动。我们以抗战期间著述丰厚的老舍、巴金和张恨水为例略作概述。

老舍说:“生活不单困苦,而且也不安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年,这三年,日本费尽心机,用各种花样来轰炸。有时候是天天用一二百架飞机来轰炸重庆,有时候只用每次三五架,甚至于一两架,自晓至夜的施行疲劳轰炸,有时候单单在人们要睡觉,或者睡的正香甜的时候,来捣乱。……我在夏天可必须离开重庆,因为在防空洞里我没法子写作。于是,一到雾季过去,我就必须预备下乡。”^[11] 1939年5月,老舍赶在日军轰炸前完成四幕话剧《残雾》,1939年11月9日首次公演;1940年2月动笔写长诗《剑北篇》,中间耽误,10月再次动笔;1940年4月5日,完成《国家至上》;1940年冬,写《面子问题》;1941年1月,创作四幕剧《张自忠》;1942年1月,创作《大地龙蛇》;1943年10月完成《桃李春风》,12月完成《火葬》;1944年1月动笔写《四世同堂》第一部,1945年2月动笔写第二部。

巴金说:“我能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的‘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尝过这种滋味。后来听人说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12] 1940年底,巴金开始翻译《处女地》;1941年3月29日,开始创作《火》第二部;1944年11月29日,开始写《寒夜》;1945年上半年创作《第四病室》。

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谈到,夏天敌机轰炸不停,几乎无法看书写作;夏天天气炎热,黑蚊常袭,

难以安心写作；夏秋雨多，屋漏影响写作。他的作品虽几乎都是连载，但大多也成于雾季，例如《疯狂》1938年1月15日开始连载；《新游侠传》于1938年12月15日开始连载；《八十一梦》于1939年12月1日至1941年4月25日之间连载；《负贩列传》（《丹凤街》）于1940年1月1日开始连载；《水浒新传》于1940年2月11日开始连载，未完；《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于1940年3月开始连载，未完；《赵玉玲本记》于1940年10月1日开始连载；《偶像》，连载于1941年11月1日至1943年3月28日。

不单老舍、巴金、张恨水如此，几乎所有作家都是如此，大多在雾季完成他们的大部分作品。40年代被公认为中国长篇小说繁荣昌盛的时期，重庆的雾为此起了很大的作用。假如作家们像抗战初在上海、南京、武汉那样整天躲命，又怎能静心构思、安心写作呢？这也许是为抗战初期几乎没有长篇小说问世的主要原因之一吧！

雾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作用莫过于促成了40年代戏剧的大繁荣。这也是与重庆的雾分不开的。

1937年12月28日，在武汉成立了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定每年10月10日为戏剧节，但第一届戏剧节并未在武汉举行。大批戏剧界人士先后荟萃雾都，第一届戏剧节纪念活动在重庆展开，“活动共持续22天，500余名话剧和戏曲工作者，上千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参加了演出活动”^[13]。到重庆后，戏剧界意识到雾季的大好时机，由此形成了著名的“雾季演出”。1941年10月11日，雾季演出开始，称为雾季公演。雾季演出一般从上年10月到次年5月，共举办4届：第一届雾季公演在1941年10月至1942年5月，上演剧作35部；第二届公演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6月，上演剧作24部；第三届公演于1943年10月至1944年6月，上演剧作22部；第四届公演于1944年9月26日至1945年6月，上演剧作19部^[14]。胡润森总结说：“陪都雾季公演连办4年，堪称优秀剧本联袂而出，精彩演出应运而生，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厚重一页。”^[15]因为有每年昌盛的雾季演出，很多作家致力于戏剧写作。郭沫若剧作几乎都是在重庆写成并上演，被公认为是郭沫若艺术生命的第二春；曹禺在重庆完成并上演了《家》、《蜕变》、《北京人》；老舍在渝完成多部戏剧；茅盾完成了他的唯一的戏剧《清明前后》。重庆雾季舞台还培养诸多优秀演员如赵丹、白杨、张瑞芳等。如果说北京古都和高校氛围为“京派”提供了必要条件，上海的租界和商业气息造就了“海派”，重庆的山和雾则为“渝派”提供了必要保障。

雾为作家生存和创作提供了保障，为中国现代文学在抗战年代的繁荣提供了保障。然而今天，我们大多从思想政治角度出发，对雾以及雾都文学只承认其批判性立场。但当雾进入作家创作内部时，极少有人

会赋予雾以美好的情感。只有冰心是个例外，她写到：“我们从淡雾里携带了心上的阳光，以整齐的步伐，向东向北走，直到迎见了天上的阳光。”^[16]

很多人不喜欢雾，认为雾有损人的健康。王西彦《山中札》说：“一个弥漫混沌的世界，雾的世界，我走出村口，走到江边，我迎着那细小的，隐约的，执拗的，损人健康的雾雨，我冲破着它。”包白痕认为浓雾造成了《忧郁的山城》：“正日云雾弥漫，很难见到红嫩嫩的太阳，住在这里，像住在牢狱里一样，没有光亮也没有热力，冷酷、阴森、沉闷，紧压在人们的心头上，如肺病的患者，感到了呼吸的窒塞。生活在这忧郁的山城，已有一年了，从春天到秋天，秋天到冬天。每天，我的心如压着一块铅石，是那么沉重。”“生活在这忧郁的山城，我底心也如山城一般的忧郁，没有光亮，没有热力，有的只是灰暗的雾，乌黑的云，蒙蔽着山，遮蔽着山城。”司马迁《重庆客》也说：“在冬季，人们生活于雾中，略略感到了呼吸的沉重。”

雾在诗人笔下也让人感到沉重、烦闷和讨厌。任均在1941年1月23日浓雾的山城中写了《雾》：“雾——白茫茫的雾/雾，盖住了树林、房屋、山岗、河流……/雾/遮断了璀璨的阳光/人们的视线/所有的道路……/这时候/许多人/都感到了/极端的迷惘/无限的焦躁/难堪的苦闷……/像居住在深海的鱼类/变成了一个谜/更看不清眼前的一切/更猜不着/前路/正有什么东西在等待/在埋伏。”江村把雾比作《灰色的囚衣》：“雾/昏暗而浓重的雾/弥漫在山林，迷漫在山谷/像一副苍白的纱幕/隐蔽了凋零，残朽的景物。天/扳着死灰的脸/挂下绵绵的雨丝/像无数根铁柱/围成了人间的囚室/雨声/滴出深深的厌烦/像一个年老的狱吏/叨叨的吐着怨言。葱郁的茂林晦暗了/碧绿的岩岩霉湿了/广阔的田野/在死寂的雾层里沉沉地睡了。生活在山国里的人们/坚强的在苦难里煎熬/千万颗炽烈的心/是千万只向往自由的鸟/它将突破这灰色的笼啊！”邹绛展示了在浓雾中《破碎的城市》：“趁着傍晚我攀上这城头上面的/楼阁/但对着这云雾低漫的宇宙/我却无法唱出我悦意的歌/……/浓重的云雾压着对河的山/压着没有钟声的庙宇，压着/蛰伏在每个屋脊下面的灰暗/而噤住喉舌的生物/我想歌唱/我想唱一曲充沛着热烈与光明的/歌，但对着这云雾迷漫的宇宙/我却无法调整我自己的音律。”艾玲因为受够了雾而《没有留恋》：“让灵魂在屈辱里哭泣/让雾把健康挪走了/生命在这里/只有灰色的影子/灰色的死亡/别了，你古老的山城/别了，你这一串褪了色的日子。”郭沫若认为雾掩盖了《罪恶的金字塔》：“雾期早过了/是的/炎热的太阳在山城上燃烧/水成岩都鼓暴着眼睛/在做着白灼的梦/它在回想着那无数亿年前的海洋吧？/然而/依然是千层万层的雾呀/浓重得令人不能透息/我是亲眼看见的/雾从

千万个孔穴中涌出/更有千万双黑色的手/掩盖自己的眼睛。”

对小说和戏剧来说,“重庆和冬雾倒几乎成了入蜀作家一个最大的‘母题’,围绕它们诞生了蔚为壮观的大后方小说和大后方戏剧,仅题目与之相关的戏剧就有《雾重庆》(宋之的)、《山城故事》(袁俊)、《重庆二十四小时》(沈浮)、《残雾》(老舍)、《重庆屋檐下》(徐昌霖),小说《雾城秋》(艾明之)、《雾都》(李辉英)、《新都花絮》(端木蕻良)等等。在这些作品中,重庆城及其挥之不去的浓雾常常成了腐败、空虚的背景或者象征,它们共同组成了那黑暗的大后方”^[17]。张恨水对重庆乌烟瘴气的社会氛围强烈不满,催生出他对“雾重庆”的批判,在《八十一梦》、《傲霜花》、《纸醉金迷》、《魍魉世界》中,雾是黑暗污浊的现实的隐喻,是知识分子生活贫困、内心压抑、灵魂扭曲以及迷失人生方向的象征。巴金《寒夜》中的冷雨冷风、天寒雾浓,让人如掉入冰窟,作品中人物沟通的无望、前途的渺茫、挣扎的心酸,无不让读者品味到作品的“寒夜”叙述和悲凉的风格。

重庆的雾尽管在当时为作家们的生存和写作提供了保证和依赖,但在作品中多被作家批判。实际上,依赖于雾的保障而又批判雾,正如依赖体制的保障而又不断批判它,这不正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么?在阳光与雾中,我们往往陷入了非此即彼的简单论断。当太阳升起来时,雾就被无情驱散,或者仅仅承认对雾只能是以一种批判立场来表现对阳光的呼唤。对于发生在以“雾都”为中心的“战时重庆文学”,人们也常持同样的观点。从历史本身和人的生存出发,我们就会发现雾的丰富,也会发现战时重庆文学的丰富。

雾确实应该是一种代表,一种象征,代表着重庆的地域特色,象征着作家在重庆的生活和体验。我们对雾、对重庆、对当时在重庆的作家和作品都是持一种简单的二元论:要么坏,要么好;要么黑暗,要么光明;要么反动,要么革命。非此即彼的简单论断,其实都是政治决定论在文学评价上的体现。重庆文学的

盛衰,皆因其战时政治中心地位,本该留存的积淀也因此而受到批判。正如有学者所总结:“随着抗战的结束,也几乎就是在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文学资源都纷纷远离了重庆,先前的冷寂重新降临。”^[18]今天我们的研究如果仍不重视重庆地域和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的双向互动关系研究,重庆最重要的文化资源将会被我们遗忘,对于中国抗战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理解,无疑会是一种缺失。

参考文献:

- [1] 方敬. 以群在重庆[G]//作家在重庆.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3:179-187.
- [2] 徐迟. 重庆回忆[G]//作家在重庆.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83: 22-34.
- [3] 张恨水. 重庆旅感录[J]. 旅行杂志, 1939(1).
- [4] 张恨水. 重庆旅感录续篇[J]. 旅行杂志, 1940(1).
- [5] 小林文男. 抗战时期苦难的重庆[G]//重庆文史资料选:第30辑.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74-103.
- [6] 李又宁. 捡来的童年[G]//重庆文史资料选:第30辑.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104-112.
- [7] 沧一. 重庆现状[J]. 宇宙风, 1938(69).
- [8] 思红. 重庆生活片断[J]. 旅行杂志, 1940(4).
- [9] 顾梦五. 闲话战时的首都[J]. 旅行杂志, 1939(11).
- [10] 凯礼. 战都的元旦[J]. 旅行杂志, 1940(4).
- [11] 老舍. 八方风雨[M]//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 香港:香港三联书店, 1981:463.
- [12] 巴金. 巴金自传[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234.
- [13] 石曼. 第一届戏剧节纪盛[M]//雾都剧坛风云录[M].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1:218.
- [14] 石曼. 重庆抗战剧坛纪事[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1995.
- [15] 胡润森. 大后方戏剧现象概观[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9(3):268-283.
- [16] 冰心. 摆龙门阵——从昆明到重庆[M]//冰心选集:第2卷.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145.
- [17] 李怡. 现代四川文学巴蜀文化阐释[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269.
- [18] 吴伟强, 李怡. 中国抗战文学研究的新的可能[J].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6):169-172.

责任编辑 韩云波

The Fog in Chongqing and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Literature

ZHANG Wu-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fog is Chongqing's natural phenomenon, bu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it became the most popular images. The bombing airplanes could not come to Chongqing because of fogs, and writers can live safely and write peacefully in winter, and thus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ncluding novels and dramas develop prosperously. At the same time, writers do not like fogs because it does harm to health and normal human feelings. Of course the writers think that there is a symbol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og and the Kuomintang corrupt rule. A multi viewpoint of fogs can help us understand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center and regional culture of Chongqing.

Key words: the fog in Chongqing; political center; survival safeguard; writing safeguard